

●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CITY PLANNING & DESIGN THEORY

Eamonn Canniffe

城市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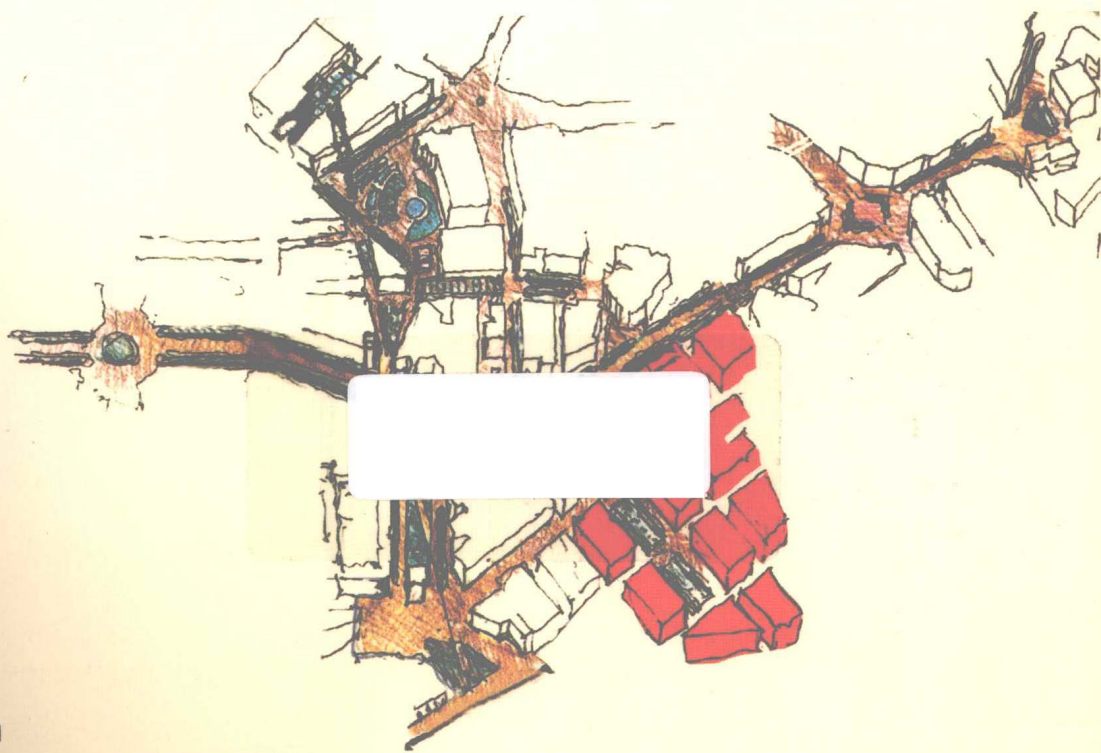
——当代城市设计

Urban Ethic

Design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英] 埃蒙·坎尼夫 著

秦红岭 赵文通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属市管高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SJ201110016009）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伦理

——当代城市设计

[英] 埃蒙·坎尼夫 著
秦红岭 赵文通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0-131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伦理——当代城市设计 / (英)坎尼夫著; 秦红岭, 赵文通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3.5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ISBN 978-7-112-15110-3

I. ①城… II. ①坎…②秦…③赵… III. ①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4881号

Urban Ethic: Design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Eamonn Canniffe, ISBN-13 978-0415348652
Copyright © 2006 Eamonn Canniffe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aylor & Francis Grou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英国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在中国销售。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贴有 Taylor & Francis Group 出版公司的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责任编辑: 董苏华 / 责任设计: 赵明霞 / 责任校对: 陈晶晶 赵颖

国外城市规划与设计理论译丛

城市伦理

——当代城市设计

[英] 埃蒙·坎尼夫 著
秦红岭 赵文通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张: 12¹/₄ 字数: 280千字
2013年5月第一版 201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ISBN 978-7-112-15110-3

(2291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目 录

致谢·····	IV
导 论·····	1
第一部分 城市发展的进程 ·····	7
第 1 章 城市的问题·····	9
第 2 章 历史城市·····	21
第 3 章 工业城市·····	38
第 4 章 后工业城市·····	56
第二部分 城市环境的元素 ·····	75
第 5 章 城市伦理——城市化的四重模式·····	77
第 6 章 格局·····	95
第 7 章 叙事·····	112
第 8 章 纪念·····	130
第 9 章 空间·····	147
第 10 章 城市未来·····	164
参考文献·····	181
译后记·····	186

致 谢

本书源于我的不同经历，包括教育、社会以及职业方面，从中形成了我关于城市的种种观点。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的家乡曼彻斯特的衰落与复兴。不论你对曼彻斯特的城市设计和特定的决策持何种保留意见，这个城市的活力与能量就是一个自信的城市生活的明证，而且，它的影响作用值得人们关注。然而，我关于这个城市的幼稚看法——由烟囱和厂房屋顶所构成的城市天际线、坚固耐用的公共建筑——如果我要理解它们的意义的话，需要一种表现形式。剑桥大学建筑学院的彼得·卡尔（Peter Carl）让我对城市的观念豁然开朗。他在教学中连珠炮似地向学生提出了关于建筑与城市化之间棘手关系的概念与思想。他将柯林·罗（Colin Rowe）和弗雷德·克特（Fred Koetter）的《拼贴城市》（*Collage City*）一书介绍给我，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书，彼得还提供给了我一份长长的参考文献，那是我一直试图完成的，为此我要感谢他。

剑桥大学达利博尔·韦塞利（Dalibor Vesely）的思想，具体表现了欧洲城市的文化，为我的城市环境观奠定了某种形式的思想背景，即从明显的功利主义表象之下挖掘城市环境所蕴含的意义。在我看来，当我大学毕业回到曼彻斯特时，相比于欧洲大陆的其他城市，除了表面上的审美差异外，英国的城市正在变糟。因而，为了研究成功的城镇发展进程，我仔细钻研了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所留下的经验。我期待未来能出版一本研究意大利广场的书，这些多数来自罗马经验的东西，也为本书奠定了一种学术背景，对此应向其致谢。

在这一时期，我逐渐认识到当某个事件发生时，广场的政治意义往往超越其美学价值，为此我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更加关注家乡。1996年由爱尔兰共和军（IRA）制造的曼彻斯特市中心爆炸事件，导致了城市面貌的改变。那次教训所带来的混乱结果让我惊愕，而相互竞争的城市重建计划遍及英国，这些都促使我写成了这本书。

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大学的许多同事与学生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尤其想感谢戴维·布瑞奇（David Britch）、普雷·奇利斯（Prue Chiles）和多米尼克·罗伯特（Dominic Roberts），他们阅读了本书的某些章节，帮助我澄清了一些表述不清的观点。最后，我非常感激彼得·莱西（Peter Lathey）耐心地帮助我编配图片。

导 论

在过去的 25 年中，英国城市的物质与社会重建已上升为一种政治议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高度。有关去工业化 (deindustrialization) 的争论、失业、人口减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衰减等问题，成为出台一系列城市政策与计划的根据，目的就在于扭转城市的衰退和无序蔓延，恢复城市适宜的居住、工作和休闲环境。在这一进程中，城市设计的角色也开始转变，从以前对其所持的否定性评价（一种不成功的全面重建计划的产物），到能够使社会的愿望得以真正实现的一种设计准则。然而，鲜有城市重建的范例，能够展现城市设计始终如一的品质。对于大多数的城市重建而言，相互竞争的商业发展区域与先前城市景象中的衰退区域相互交织，构成了一种不连续的城市碎片。从一个更广的方面来看，20 世纪的城市巨变，依然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城市精神。然而，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断定，城市自身的变化只是源自 18 世纪后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而已。我们有趣地发现，在新世纪，城市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全球化，到对环保问题的觉醒。但有一点很明确，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与技术的力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使得城市设计理念受到严重制约。

这样的分析也许显得过于悲观，但它起因于我们很难洞察到个人受益于城市发展的一些积极的方面。由于受到短期的商业价值或时尚价值判断的影响，似乎对我而言，当代城市景象有点受到损害。正如卡斯滕·哈里斯 (Karsten Harries) 在他的著作《建筑的伦理功能》(*The Ethical Function of Architecture*) 中所言，至少在发达国家，社会发展植根于：

尽管现实中无数问题依然留待技术解决，但谁又能否认技术的进步至少帮助我们减轻了生活中的一些重负。相比我们的前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技术的进步使我们的身体和行为减少了地域和时空的限制。如果不能肯定这些对象化理性 (objectifying reason) 的自由潜能，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但是，这样的肯定并不意味着可以有纯粹理性的专制。因在它的另一面，我们却不断悲叹现代定居没有归属感。毫无疑问，科学技术让我们变得更加自由。但不言而喻，这样的自由让我们更不愿意安居于我们一直生长的环境，让我们更愿意去尝试新的居所。不仅如此，

精神的自我提升也为我们打开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Harries 1997: 66-68)

尽管最近有迹象显示,英国一些地区的社会流动开始减缓,但正是在这些地区却可能孕育一些产生积极因素的潜力。在一种主要由城市居民所主导的文化中,如何回应他们的需要,对任何设计学科而言都是一个重要动力。尽管如此,设计是一种类似“杰纳斯”(Janus)^①的概念,面对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却受着同一种力量的联结。那些表面上相互对立的方向是功能性与审美性,而它们之间的联结是保持这些观念平衡的理性力量。最初人们提出功能与审美之间的平衡,是为了改变设计实践中对比例的依赖。由于设计对象与人体尺度有紧密联系,设计便很容易被视作受到制造方式与实现其功能需要的限制,而审美作为一种设计因素却并不重要。然而,一种景观,尽管其使用了有机材料而具有生态学方面的意义,实际上却很少提供明确的实用功能,对于设计者与使用者而言,它更多满足的是人们的审美需要。

在功能与审美的两极之间,设计与城市有什么关联呢?那就是它们能够共同分享一种比例上的特性,这种比例特性与设计景观或自然景观相联系。但是,功能性的需要同样重要,个体与群体作用的结合,可能提出审美控制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来自不同制度的特定秩序的伦理调节力量,也是建构城市设计理论的需要。正如黛安娜·阿格雷斯特(Diana Agrest)所指出的:

在有关建筑的理想中,城市总是被一些享有特权的地方所占据——这些地方使社会等级成为可能。这是一个虚构的地方,展现着无数不同的秩序,有着无尽的宝藏。但是,城市也是由这些秩序积聚而成的物质空间,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彼此破坏或支持。空间的神话同时记录了存在的或不存在的、现实的或抽象的神话。这是一种斗争,城市的状况是由相互冲突的秩序积聚而成,即它的无序性与城市和建筑理论发展所表现的追求秩序的意愿。

(Agrest 1991: 109)

有关秩序的议题,即如何表现秩序以及表现什么样秩序的问题,在城市设计中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因素,它们被分割在不同的领域。在我看来,当前情形下有关秩序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并呈现于三个不同的领域,即职业的或学术的领域、技术的领域以及可称为社会的和教育的领域。我这

^① 在罗马神话中 Janus 是 天门神,早晨打开天门,让阳光普照人间,晚上又把天门关上,使黑暗降临大地。他的头部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同时看着两个不同方向,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因此也称两面神,或被尊称为时间之神。——译者注

本书的重点将放在第一个领域（虽然其他两个领域也应受到关注），当前争论的问题是建筑的适宜性以及不断极化的城市外观。一定程度上说，过分强调观点之间的争辩，将难以客观地分析问题：尽管大多数成功的城市综合体（urban complexes）因其历史性而具有传统特征，但很明显，不同的理论家要么是在回归传统形式（也许最好的代表是美国的新城市主义），要么是对全球化进程的认可（我将要提到的新现代主义就倡导与信奉），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的选择。

在第二个领域即技术领域，由于现代主义并没有导致一种都市主义，因而不能算是明显的技术层面。这种怀疑的态度来自客观冷静的认识，与许多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一样，这一领域尤其与对资源的浪费利用有关。伴随着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负面经验，材料方面的使用不当，以及公众对职业团队认同感的降低，激起了人们对历史城市环境的怀恋。无论现代主义表达的社会意图是什么，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的出现，现代主义对资源的挥霍便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负担。目前，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观点，在大多数的城市设计过程中仍然扮演着一种不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在那些奉行货币主义经济原则的社会尤其如此。例如，环境与健康的损害由人们对私人轿车的过度依赖而引起，但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忽视，除非其影响被人们直接感受到。

最后，在城市环境的营造中，由于短期的经济压力，以及设计人员不能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从而使设计成为越来越边缘化的因素。与 20 世纪中叶现代主义城市所坚持的美学态度类似，整个战后重建，起初是在规划形式方面，后来则是在更广泛的环境中都将其视为主要的处理手法。最近几年在公众心目中，原本将城市看做一种可以彼此分享空间的主观判断，已经被取代了，而且开发商们全然不顾可能让人们彼此疏远的后果，更愿意完全通过经济价值来理解所谓成功的城市环境。对城市设计的美学语言而言，随之而来的有害影响，便是用一种更加狭隘的社会视角来判断城市环境，判断哪些环境是注定受欢迎的。

历史告诉我们，对那些针对解决城市问题而提出的道德建议我们应持谨慎态度，不过这些观点却向城市设计者们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个体原子化的社会（atomization of society）将人们区分成截然不同的团体，除了对个人权利与私有财产的保护外，共同所拥有的价值越来越少，那留给公共空间的地方在哪里？在被认为是日益透明的当代城市环境中，社会排斥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在城市更新的名义下它的影响时常被夸大。诸如城市移民、无家可归者这些边缘群体，他们经常居住的城市区域，被地方当局与开发商看做难以带来适当的利润。在公共领域的私有化过程中，这些边缘群体被迫不断迁移，以有利于一些新的群体，因为这些群体可自由支配的收入较高，能够

支持零售业发展并有能力投资昂贵的住宅。在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愿景方面，审美扮演着重要角色，它确保新的居住者了解最好的或者至少是最新的值得拥有的消费物品。这种城市设计方案服务的是一部分人群，他们已经过着良好的生活，多数是有钱人，这些人不包括处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典型家庭以及贫困人群。英国城市更新中的一些标志性成就，往往限制了商业以及与日常居住生活有关的社会发展，诸如没有提供学校或有利于加强社会联系的一些社会机构。在这种情形下，公共领域变成了这样一种区域，即相互排斥的群体只能偶然接近，由此清楚地表明公共领域既是一种边界，又是一个冲突的区域或者是一个无人地带。

由于对城市更新所取得的大量成果感到失望，在本书中我将阐述我的观点，提出我所赞同的有关城市演进方式的基本论点，并解释一种受到怀疑的激进的解决方案。目前，科技发达的国家拥有较强的实力使城市环境得到较大改变，但伴随逐渐增长的不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奢侈的机会。下面转到我早先提出的三个领域的第一个方面，即在职业的或学术的领域，围绕城市类型的各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能在更深层次上考虑城市生活如何才能有益于城市市民的问题。一方面，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大多数诱人的城市愿景是由《新城市主义宪章》(*Charter for the New Urbanism*)提出的(Duany et al. 2000: 256-261)，追求这一愿景的强烈意愿，绝不少于人们的选择性失忆，即对那些令美国社会获得舒适生活的技术丧失警觉。正如《哈佛设计学院购物指南》(*Harvard Design School Guide to Shopping*)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样(Chung et al. 2001)，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与新现代主义(Neo-Modernism)观点相对立，新现代主义抛弃了现代主义先驱者们以改革者自居的伪装，赞成应服从市场的需求。对我而言，这两种选择似乎都是非道德的：新城市主义因其自以为是地想限制城市居民应当怎样生活，而新现代主义则因其很难满足创建全球城市过程中的人性化需要。而在风格上和经济上的冗余(redundancy)^①现象，驱使人们有必要讨论“城市伦理”的基本问题。

尽管对城市风格的表层问题有许多保留意见，但城市的空间形态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的体现，因而我们有必要探索一种更加积极的城市模式及其运行机制。本书将提出一种分析与设计城市环境的方法论，力图将那些能够明确分享的精神特质(ethos)置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反对个别化的争

① 冗余(redundancy)的概念在计算机技术领域中最早出现，指重复配置系统的一些部件，当系统发生故障时，冗余配置的部件介入并承担故障部件的工作，以减少系统的故障时间。在建筑领域中，冗余空间作为一种空间样态在空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空间功能拓展的空间储备，也是提升空间品质、满足某种精神需求的手法。——译者注

执，鼓励多样性，因为这对城市生活能够产生有益的影响。本书的第一部分（第1—4章）将追寻城市的历史发展线索，即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环境，以此分析当代城市状况。本书的第二部分（第5—10章）将讨论那些在方法论意义上所提出的城市的基本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有代表性的城市环境。我们要明白的是将城市划分成特殊的范畴是有局限性的，但这种划分不过是分析城市进程的一个必要的部分。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按时间的前后顺序来排列的，本书的第二部分涉及历史原型内部的格局（patterns）、叙事（narratives）、纪念（monuments）和空间（spaces）。它们可视为是对我的信念的一种表达，不是在历史性进程的模式之中，而只是对我们所处的历史背景的一种小小的限定。我力图在分析与创造性表现之间达到平衡，这将确保有一种解释性框架，它能够有效地处理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第一部分

城市发展的进程

第 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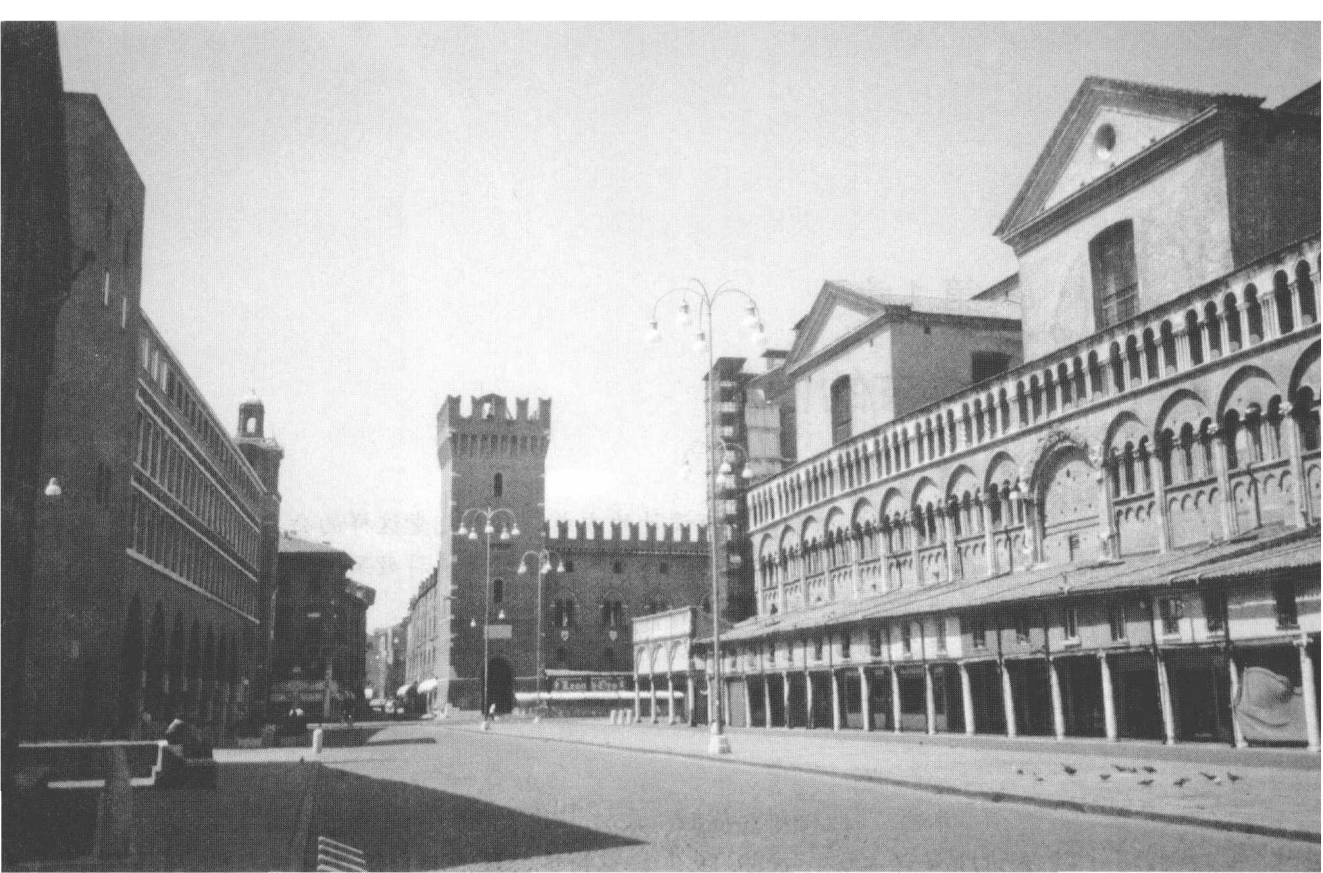
城市的问题

这是以往时代城市设计的方式。像大礼堂这样的公共集会场所总是有着规则的形式。为了达到人们期望的某种效果，设计了引人注目的开放空间。与之相反，方案中不规则的地方，总是封闭于建筑内部或隐藏于墙内，其步骤既简单又聪明。如今，我们却遵循着相反的城市设计进程。

(Sitte [1889] 1945: 56)

卡米洛·西特对当代城市设计中的矛盾有着伤感的论断，如果考虑到这些论断来自 100 多年前，我们会觉得他的观点显得更加尖锐。西特被后来的功能主义者视为保守派。他希望城市设计能够恢复清晰而明确的空间序列，以及总体上的围合性。在城市发展方面，西特的声音，为那些相信城市的物理构造不仅仅是土地价值加上交通便利这样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Schorske 1981: 62-72)。西特所研究和描绘的城市，也是我们至今所崇尚的，即城市是作为一种居住实体而存在的。人们在城市中有着商业化的生活，通过彼此交流而使城市运转。但是，城市作为一种社会和精神实体，这些功利主义的需求没有一个发挥了主要作用。

西特的观点，主要见于 1889 年出版的《遵循艺术原则进行城市建设》(*City building according to artistic principles*) 一书。从根本上说，这是一本美学方面的著作，但在此书中却表达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在他一系列的论文中，他将 19 世纪城市规划中对网格形式的依赖，与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规划中的围合性公共空间风格加以对比，严厉斥责了当时那个时代城市规划中的理性主义方法。在他访问了欧洲的许多小城，并分析了那些城市的特色之后，他提出了一套有关街道与广场的关系、纪念建筑的位置等方面的设计原则。他提出的城市发展模式，是怀旧的，并且明显是从建筑学上提出来的。他亲眼见证了家乡维也纳发生的急剧变化，这种变化代表着传统城市的死亡，其具体表现就是修建了宽阔的林荫大道，以及有着整齐划一的、孤立而庞大空间结构的环城大道。西特在书中总结了他所提出的设计原则在维也纳的具体应用情况，提出新建的公共建筑应当具有围合性，以便提升建筑物立面的美



学效果。他试图探寻在交通主导的模式下，城市空间如何才能创造出具有适宜特色的可识别空间。虽然他的设想从未实现过，但在 20 世纪早期，阐述其观点的书籍和译著却对欧洲和美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特的分析方法主要基于对城市空间和城市中心区域的经验性解读，而不是一名精明的规划者如神灵一般地对城市进行总体安排。尽管如此，他对城市设计的种种探索，尤其是他提出的“涡轮式广场”（turbine plaza），暗示了一种潜在的使用秩序，其结果是既具有普遍性也针对了独特的城市文脉。西特的分析视角趋向保守，即便他身处的时代复古主义盛行，他的观点是否与 21 世纪早期的都市主义有关，仍然是一个问题。他的研究成果的意义，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西特在文化传统的影响下，通过观察中世纪体现古希腊城邦理念的意大利城市 and 伊特鲁里亚人（Etruscan）基于对天体解释而提出的卓越规划策略，以及罗马帝国的图像学（iconography）原理，提出了他的城市设计原则。中世纪的城市文化，常常被像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这样的 19 世纪的艺术评论家们，引证为现代城市环境应该效仿的范本（Hunt 2004: 152-168）。这些城市，作为商业贸易中心与文化中心，在经济财富与建筑特性上，可与当代的全球城市相媲美。其次，西特对当时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及功利主义状况做出了评价。在他们所说的服从于设计需要的地方，

图 1.1
费拉拉的
特伦托和的里
雅斯特广场
（Piazza Trento e
Trieste）。坐落
于中世纪城市
的中心，它的
一侧紧靠罗马
风格的主教堂。
广场的商业建
筑采用敞廊形
式，与耸立于
广场的市政与
宗教建筑相互
补充

工程师的影响支配了绝大多数的新建区域，而建筑师的工作却被限制在公共建筑的设计方面。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所看到的一样，在工业化早期的曼彻斯特，像恩格斯这样的观察者，对受到资本家剥削的底层群体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行了描绘（Engels [1844] 1987）。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看到了城市空间的物质特征与经济基础、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西特对城市问题的观察，鲜有政治上的激进性，如恩格斯认为，现代城市的空间形态是导致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因素。在英国的城市更新范例中，以及被赞誉为具有全球商业活力示范作用的东亚新的发展中心，这种影响并不因其太小而看不到。下层人士糟糕的生存状态被大大地忽视了。而且，最终，以环城大道中复古主义的纪念碑风格为典型代表的19世纪维也纳传统，也预示着当代城市的建筑特征，即其统一的秩序被我行我素的地标性建筑与缺乏连续性的城市环境所替代。历史风格的城市至少传递出这样的理念，即在古希腊或者文艺复兴时期城市形态所表现出的民主性与文化性。由于当代的建筑设计更多地来源于建筑师的个人选择，因而当代建筑中种类繁多的建筑语言往往不容易被了解。再次，西特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空间的形态方面，他试图克服空间形态的不连续性这一问题。

当代的城市设计，在许多方面仍然完全受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an）所提出的城市规划教条。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人们都满腔热忱地贯彻着这样的规划策略，即用高楼大厦和高速公路取代传统城市低矮的建筑形式。由此所导致的立体的、零乱的以及单调乏味的“城市沙漠”现象，正是人们期待城市设计者们要解决的难题。然而，这个艰巨的任务似乎难以实现。一些地方被废弃，这也许是工业化衰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人们无法预料技术上的失败和社会的变迁。但是，更多的地方却是在令人生疑的进步的名义下，使城市的美学特征发生了急剧变化。这种所谓的进步，仅仅对孤立的、被小心隔离起来的社会精英阶层有点价值，而据说这些始作俑者还拥护平等主义，这显然是许多令人感觉讽刺的事情之一。然而，认识到这点很重要，目前所争论的关于有重大意义的城市设计风格问题，同样深具讽刺意味。因为，新城市主义与新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们共同争议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城市空间的商品化问题，尤其是对公共领域私有化的认可。现代主义背景下空间的充足供应，仍然遵循传统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尽管假定这些空间只会带来有益的用处也许显得过于乐观了。偏执地用非常直接的方式控制公共空间中人的行为，这种想法注定会带来失败的结果。

细致的观察分析当今城市设计中的一些现象，将促使人们探讨以往在城市空间的公共性与开放性方面的表现形式。从不同的历史表现形式来看，城

邦被视为一个有机体，实际上，它还常常被视为一种保护神。由此，将市民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理解为通过联合体而起作用的互为一体的关系，便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了。作为一种政治实体和社会实体，古代的城邦与当代的城市几乎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纵使这些城市严格限制市民资格，认可奴隶制，抑或受中世纪封建制的束缚，但它们并不容易按照资本主义的财产概念来划分类型。当代社会人口急剧增长，每个人都被赋予了政治权利。随之而来的城市所包含的多样性，不太可能用一种统一的形式来表达。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探讨一下中世纪的锡耶纳城，它的城市设计、建筑、雕塑和壁画，都强调要为当时寡头政治的支配地位而服务。现在的情况则是，城市的主要政治形象是由政府及商业零售部门的商业利润所决定的，而这些部门表面上并不能代表通常的西方民主制度。像过去一些美丽的城市一样，现在我们许多城市的形态是对政治体制的一种反映，但是这并非是让人积极参与的民主体制，而且人与环境越来越疏离，这样的城市环境表面上体现着公共价值，但实质上却表达着是私人利益。

上述矛盾引发了当代城市的许多问题，而通过对先前的城市文化的研究，使得这些问题更加鲜明。这样的研究，其意图并非是要陷入对逝去岁月的留恋之中。它是由我们对当代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挫败感而引起的，与其花费大量的精力去解决一些不必要的问题，倒不如将精力放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对形式与材料有永不满足的新奇追求，不能恰如其分地尊重现在的城市文脉，试图用大量的街道设施填满整个开放空间，这些都是缺乏自信的表现，源自对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及其所反映的更深远的历史趋势的肤浅理解。我坚持这样的主张，即割裂过去来理解现代城市是不可能的。以下我对不同城市情形的简要思考，将会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并依据当代审美和政治结构的特点，从历史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这三个章节进行阐述。

历史城市较为连贯一致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其紧凑性方面。在历史城市中，城市与乡村之间有着清晰的界限，通常情况下城墙等防御工事助长了城市的高密度发展，而且就城市尺度而言，城镇中心与城市边缘相距并不遥远。因而，历史城市通常既有辨识性又容易认知，其识别程度主要来自城墙内具有可辨识性的城市模式的支撑。历史城市的规划形态往往是网格状结构，这样就让市民能够比较容易地意识到不同城市区域的等级差别。相反，在一些更具有有机秩序的城市，城市的主要特征则更多地受制于地形因素，相应，这样更易于满足市民对环境方位感的需求。如果人们持有这样的普遍信念，即认为城市的存在来自神的力量，或至少城市的繁荣是由神的恩赐而带来的话，城市形态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尽管历史城市的具体特征既有优点又有缺点，但它却简单地表达了最基本的真理。经过规划的城市形态，



图 1.2

锡耶纳的坎波广场 (Piazza del Campo)。这是中世纪城市中最大的圆剧场式空间，坡状的砖砌路面使其轮廓更为分明。广场围合部分，按照一种连续协调的方式处理，增强了其独特性。此照片是从市政厅 (Palazzo Pubblico) 及曼吉亚塔楼 (Torre del Mangia) 方向垂直拍摄的

往往能够促进房地产更加规范化的发展，而城市的自由生长则倾向于会阻碍这样的发展进程，体现出的是一种难以量化的“场所精神” (genius loci)。城市设计所表现出的有意的或无意的多样性是一种较含蓄的特性，而体现都市风格的建筑语言则具有国际性和复杂性，能够唤起人们对某地的记忆并使市民受到感染。立足于城市的内部肌理，这些远非地方性的建筑式样表达出了一种自信的特质。纪念建筑的增殖功能，它们与不同城市文脉的亲合性，以及作为传统的潜在力量的见证，包括其诠释的形式与演进发展的过程，都与市民对城市生活意义的理解有密切关系 (Martines 1980)。通过认识传统城市，我们应当问这样的问题，即当代城市应当如何回应代议制政治之需要，应当如何公平地体现市民的多样性需求，并用恰当的建筑语言来加以表达。

18 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的标准性，利润率与批量生产之间的关联，对城市设计产生了影响，使其回避了传统城市的伦理价值，而这些价值往往具有超越性并被视为是永恒不变的。像曼彻斯特这样的早期工业中心城市，因为既要适应靠近贸易与金融中心的工业化区域的需要，又要适应工业化建设进程本身的需要，因而 18 世纪末以前经济获得了巨大增长，以运河为代表的新的交通基础设施，为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造业产品提供了便利。这一工业化进程是一种自我维持 (self-sustaining) 的发展进程。对于城市本身而言，工